

註釋：

1. 末成道男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2. Suenari Michio, J. S. Eades, Christian Daniels, eds.,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ociety: Anthropological Views from Japan*. Canterbury: Centr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omputing, University of Kent, 1995.
3. 末成道男，〈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漁村の特色——日韓3集落の事例を中心に〉，九学会連合日本の沿岸文化調査委員会編，《日本の沿岸文化》。東京：古今書院，1989，頁264-274；末成道男，〈韓国と中国漢族の大リニージの比較〉，杉山晃一・桜井哲男編，《韓国社会の文化人類学》。東京：弘文堂，1990，頁103-122；末成道男，〈東アジア三社会の葬礼に見られる異質性〉，溝口雄三編，《漢字文化圏の歴史と未来》。東京：大修館，1992，頁177-189；Michio Suenari, “Unilateral Kindred: A Reconsideration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In Mutsuhiko Shima & Roger L. Janelli,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Korea: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Tokyo: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8,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49, pp. 139-156.
4. 末成道男編，《中原と周辺——人類学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1999。
5. 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研究会，《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01。
6. 末成道男編，《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東京：風響社，1997。
7.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民族誌のマルチメディアの形態をさぐる——大森康宏教授「新しい視覚情報開発のための民族誌映画の分析と活用」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し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2003，卷35，頁31-35。

追悼末成道男教授

清水純（日本大學特聘教授）
（蔡志祥譯）

末成教授是我在東京大學文化人類學研究院的學長。我的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得到末成教授種種形式的影響和指導。我還是大學本科生時，當時在聖心女子大學工作的末成教授曾經以兼任的身份，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園講授社會人類學課程。課程主要是導讀《馬淵東一著作集》。然而，當時我對社會人類學還沒有很大的興趣，而且馬淵東一的文章很難讀，所以就沒有選修這門課程。和末成教授的研究交流，是我進入研究院後，通過「仙人會」才開始頻繁起來。

一、仙人會的活動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中國的開放政

策，在日本研究中國民族文化的熱潮日益高漲。1981年，我在研究院攻讀碩士時，日本的幾所大學的一些對中國有興趣的年輕研究生組織了一個名為「仙人會」的研究會，我是其中一個成員。我們每個月在不同的大學借用教室，讓來自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民俗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和文學等不同專業的成員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研究會組成不久的某一天，末成教授默默的進來、隨意的坐下，聆聽同學的報告。當時我覺得很詫異。末成教授的年齡比我們這一代的研究生大得多，而且已經是教授級的身份，為什麼還會參加像我們這樣的青年朋友的研究會？我甚至認為參加這樣的以年輕學者為中

心的研究會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末成教授似乎並不介意年齡和身份的問題。從那一天開始，末成教授就融入研究會，成為不可或缺的「同志」。教授任教的聖心女子大學的教室，時常用作研究會的場所。

末成教授從聖心女子大學轉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時，計畫編纂一部以中國為對象的文化人類學的文獻解題的書，綜述中國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涵蓋臺灣、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的研究成果。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仙人會」的33位成員響應了末成教授的號召，從事編輯、討論、解題和撰寫各章節等工作。我被安排負責撰寫台灣原住民的研究。這一本匯集了年輕研究者力量的書，以《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為名，在1995年出版。¹

《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出版的前一年，「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在台灣開館，同時啟動了海外對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資助。日本的資助機構是東京大學，以末成教授為代表。因此，他號召專門研究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者，成立「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雖然研究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者數量不多，但一開始就聚集了來自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生態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專業領域的成員。這個研究會包括了從年輕到資深的不同年齡層的成員。此時正值年輕一代開始對台灣原住民產生興趣，研究會逐漸成為年輕和資深學者交流的場所，分散在日本全國各地的、默默耕耘的學者，因此得到定期的、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在五年的資助期間，末成教授推動了許多研究計畫。其中之一是出版一部作為台灣原住民研究指南的研究概述和文獻解題的、百科全書式的研究手冊。日本人撰寫的關於台灣原住民的研究資料種類繁多，除了台灣總督府進行的各種原住民的調查報告外，還有從殖民時期至今的豐富的語言、社會、文化、宗教、歷史、考古等方面的專題研究。我們收集了對台灣原住民研究有用的各類基礎文獻，其中包括大量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中沒有介紹的文獻。計畫的成員從各自的專業領域撰寫概要和解題。其成果發表

為《台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角》（《台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視角》）。² 撰寫該書的成員20餘人。雖然人數較撰寫《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評論》的成員少，但總頁數也有430頁。這不僅是對於有志從事臺灣原住民研究者的一部很好的入門書，也是一本對研究者自身有用的工具書。此後，末成教授將注意力從台灣研究轉向越南研究，並彙集研究越南的成員，出版《ベトナム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日本からの視点》（《越南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日本視角》）。³ 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末成教授動員了各領域的研究人員，編寫了三本研究亞洲地域的基礎書籍，這展現了教授的組織能力。

末成教授不是那種高高在上、強勢牽引推動的領導者。他總是讓年輕的研究者在沒有等級分明、優劣高低的平和的氛圍下；讓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在友好的、親睦的環境下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合作。在我參與的兩部工具書的編纂過程中，雖然遇到種種的困難，但在同儕們的熱情和友好的激勵下，讓我深切感受到研究、出版過程的樂趣。我認為這部分要歸功於扮演核心角色的末成教授的親和力。這種共同信賴的、自然融入的與人交往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與不同的人打成一片，建立了信任關係的親和力，無疑是建築於末成教授的豐富的田野經驗中。

末成教授經常提到要將研究成果回饋當地社區的重要性。教授時常提醒我們「在村莊進行田野調查，不僅是住在那裡，而且時常會給當地人帶來很多的麻煩。因此，我們不僅僅收集資料、撰寫田野筆記，還要以研究成果來回饋當地社會。我們必須以論文或文獻資料的形式出版田野調查的成果。」這種思維方式呈現在末成教授的種種出版中，也提示我們跑田野的研究者的出版責任。

二、末成教授輕輕一語的啟發

我不僅有多次與末成教授一起參加學術會議和編纂出版等公眾活動的機會。末成教授在我個人研究上和學術發表時，提供了不少建議。有時候，在研究會上，末成教授的評論雖然簡短，但

卻意味深長，充滿了老師的睿智和豐富經驗。

令我最難忘的是我開始台灣實地考察的時候。我希望藉著居住在臺灣東海岸的噶瑪蘭族的研究，探討那些因漢化而長期被忽視的土著人群的問題。1984年，在完成了初步的調查後，我計畫到噶瑪蘭族居住的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進行長期的田野調查。在整裝出發，準備進行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前，我拜訪了指導老師大林太良教授，討論我的田野方向和問題。大林教授長思了一會說：「平埔族漢化程度很深，就算在那裡住久了，也未必能夠收集到什麼資料。調查時很可能會遇到不少困難。」在我出發前聽到大林教授這番話，令我開始對自己的研究構想產生了疑惑。當時我心裡想：「原住民的特徵和意識形態，即使漢化很久也應該還會殘留下來。所以，我會找到的。」但是，由於我沒有田野調查的經驗，很難在大林老師前自信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當時，我對比較神話學和歷史民族學感興趣。按照研究院的規定，必須進行社會人類學的長期田野調查。由於沒有田野調查經驗，心情非常忐忑不安。大林老師的建議可能是要我對選擇平埔族作為研究對象可能遇到的困難，做好心理準備。然而，當對世界各地的民族誌瞭如指掌的大林教授告訴我這一點時，我對自己的觀點的信心開始動搖。因為出發前聽到的這番話，令我對自己的研究感到異常焦慮。

出發前，在仙人會上遇見末成教授。我告訴他大林老師對我的忠告。末成教授的立即回應是：「不對。妳什麼都不用擔心。只要妳在田野待上一年，即使什麼訪問調查也不做，也會感受到那個社會的氛圍。那樣，妳回到日本，總能夠撰寫一篇論文。」他的話或許是為了緩解我臨行前的緊張情緒，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話語中蘊含著一位經驗豐富的田野工作者的堅定信念。聽到末成教授的話，我暗暗鬆了口氣，前往台灣。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大林教授和末成教授的觀點不同不僅是因為歷史民族學和社會人類學學者的不同觀點的問題，而且與他們不同的田野經驗有關。對於在兩個研究領域之間左右為難的我來說，末成教授的忠告推動了我在社會人類學領域

進行長期研究的執念。

末成教授的輕輕一言，對我整理田野調查資料有很大的啟示。很幸運的，我田野調查的地點還留存一定數量的包括神話、傳說和宗教儀式的民族誌資料。然而，我還在猶豫究竟應該用什麼的社會人類學取向來分析這些材料。雖然我詳細記錄了噶瑪蘭族的血緣關係，然而並沒有找到任何值得注意的親屬或社會組織。因此，民族誌記錄的目標是達到了，但是還沒有找到分析的軸心。

當我在仙人會報告我的研究和調查摘要時，末成教授也來聆聽。在我完成報告後，他給了我一個簡短的、唯一的評論：「祭祖時，每個家庭成員輪流祭祀祖先，一方面呼喚祖先，另一方面供獻祭品。這不是不尋常的祭祀方法嗎？」我當時有點摸不著頭腦的想：這真的有那麼稀有嗎？末成教授這個評論一直困擾著我，讓我不斷的思考。當我回到親屬關係的基礎研究時，終於意識到強調個體性的噶瑪蘭雙邊社會的結構特徵及其原理。社會的組織原理是可以透過血緣關係者與祖先的儀式關係而理解的。每個家族成員各自向祖先供奉祭品的祭祀方式，清楚地體現了噶瑪蘭社會的特徵。

末成教授聽了我笨拙的調查報告，隨口給了我一些提示。末成教授觀察過臺灣原住民以至東亞不同社會的祭祖方式，因此對祭祖的過程非常注意。他的輕輕點評，對我這個社會人類學的新手的博士論文的分析方向，實在給與很大的幫助。

完成田野調查後，我重新思考民族誌寫作的問題：噶瑪蘭固有的血緣觀念和社會關係的特質和宗教儀禮等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有著深層的、有機的互動關係。傳統的思維模式對觀念、關係和儀禮的變化起著很大的作用。即使經歷過漢化等各種變化，噶瑪蘭的社會生活、文化等等是相互關聯，不能簡單地用社會、宗教來分類。完成田野調查後，我覺得有必要把我在田野生活、觀察中體驗的社會和文化等等的有機結合，透過民族誌書寫出來。我在田野中一年的生活，讓我深深體察到末成教授在我田野調查前的忠告。

後來，我聽師母說，末成教授的建議通常被認為是簡短而切中要害的。我想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在我研究起步的時候，得到的末成教授一針見血的教誨。現在回想起來，由衷的對這位熟練的田野工作者深表感激和敬意。

過了一陣子，在某次研究會結束後的酒會上，末成教授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假如沒有人調查研究新社的噶瑪蘭族的話，我就會自己做。」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噶瑪蘭的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雖然我幾經周折才確定以噶瑪蘭為我的調查研究對象，但是，經末成教授的提點，我更確信選擇噶瑪蘭作為研究主題是有其意義的。如果末成教授真的調查研究新社，他會如何分析那個社會？他的分析究竟和我的會否不一樣？現在斯人已渺，我只能想像末成教授會怎樣書寫新社，他的分析會否和我的不同。

三、末成教授的阿美族研究

最後，我想就末成教授的阿美族研究著作發表一些個人看法。末成教授在研究生期間對台灣多個原住民部落進行了調查研究（排灣族：1965年6月-7月；卑南族：1966年12月-1968年7月）。他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雅美族的親屬關係和社會組織。末成教授於1968年10月至1969年7月在台東縣東部沿海阿美族的村莊進行調查，並且在1970年11月進行追蹤調查。1971年根據調查研究，以「石溪村」（假名）為名，向東京大學研究院社會學研究科提交博士論文。12年後，教授修改博士論文，在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臺灣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⁴ 本書是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少數專著之一，也是末成教授的代表作之一。該書在2007年翻譯成中文。⁵

這部著作是由「石溪村」阿美族的民族誌描述和親屬關係理論的分析所組成。其描述力和分析力堪比同時代歐美社會人類學的名著。本書以阿美族的niyaro(村莊)為中心，討論村落傳統的自治組織、阿美族特有的年齡等級以及稱為paro no loma的家族與本家、分支之間的關係。除了分析親族構成的血緣、婚姻以及姻親關係外，本書也

討論了親族動員和親族關係的變化過程。本書不僅依賴田野調查的資料，還通過日本殖民時期的戶籍調查統計資料和戰後民國時期的戶籍資料來分析貫時性的、長期的發展和變動趨勢。此外，作者透過整合統計資料與現地訪談，生動的闡明殖民時代以來阿美族社會的家庭和婚姻結構以及本家和分支關係的歷史變遷。

末成教授的分析觀點是從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出發，對於阿美族為母系社會等過去的理論的反思，特別是儘管戰後從夫居的情況有所增加，但是loma'、marininaay、ngasaw、faki、mito'asay等石溪社會特有的「母系社會」的親族組織的特徵，並沒有因為從夫居的個案增加而消失。換言之，縱使「母系」的特色逐漸減退，為何社會制度並沒有因之而產生混亂和摩擦，反而維持下去？根據現地調查的資料的分析，末成教授指出親族群體的成員資格，並非因為母系血緣的關係而獲得。在田野調查時從夫居個案的增加，可以明證阿美族的母系特徵只是在從妻居頻繁時才會顯現出來。換言之，石溪村的親族組織裡的成員資格，是由父母結婚時的居住地決定的。因此，石溪村的阿美族並非單系社會。⁶ 從而，末成教授認為從「非單系」的理論框架來理解石溪村，較諸母系社會的說法更為妥當，更能有效的說明從夫居的個案的增加而呈現的社會變化。

因為這樣的論據，本書出版後引起臺灣和日本的研究者的注目和爭議，並且對「阿美族不是母系社會」的觀點提出了批評。⁷ 日本學者中，山路勝彥指出以花蓮縣豐濱村（猫公）的阿美族社會為例，雖然雙系關係在社會關係中很重要，但從血統上來說，並不能否定母系的存在。⁸ 此外，研究大洋洲的船曳建夫認為，末成對石溪阿美族的分析和解釋不僅合適，而且在理論的層次上超越了「單系」和「非單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掌握到「親屬關係」（kinship）中的「場」（field）的概念。⁹

在末成教授提交論文的同時，Needham和Schneider分別提出了質疑親屬關係研究的論文。¹⁰ 1984，也就是末成教授的書出版的翌年，施奈德（Schneider）出版了《親屬關係的批判性研究》（A

Critique Study of Kinship)一書。¹¹ 此後，人類學的研究趨勢在很大程度上離開了親屬關係的問題。因此，評價末成教授的理論，必須考慮到社會人類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才能公允。也就是說，從論文的提交到出版這段時間，是社會人類學研究激變的時期。以這段時期的研究，評論其與社會人類學後來的發展的必然連繫，是不妥善而且有欠公允的。

一方面，在台灣社會，包括研究者在內，似乎一直有一種阿美族是母系社會或母系制度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末成教授關懷的、提出的問題並沒有怎樣的影響大多數人的阿美族是母系社會的固有觀點。

有一天，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圖書館裡，看到有末成教授這本書的完整譯本。我告訴教授可以查閱此一翻譯本。末成教授當時並不知道有這部譯本。教授於是嘗試借閱和複印這部翻譯本，然而圖書館禁止外借。教授失望地說：「即使是原著作者，我也不能借出這本翻譯書。」由於它被視為只能在館內閱讀的民族所內的資料，因此沒有太多台灣的研究者看到它。大抵，因為這部翻譯書沒有出版的緣故，末成教授的理論和觀點沒有在臺灣引起廣泛的注目。

直到2007年，末成教授的書才重新翻譯出版。該書的日文版於1983年出版，距離提交博士論文12年；而中文版又較日文版晚了24年才出版。因此末成教授的調查研究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進入中文的世界。

在台灣，因為受到日本殖民時期的人類學的進化論的影響，因此早期日本研究者對原住民的研究著作在某種程度上得以保存下來。在日本殖民時期，文化人類學本身仍處於起步的階段。因此對單一譜系以外的繼嗣關係的研究尚未有發展。除此之外，原住民的研究受到戰後從大陸移民臺灣的中國研究者的影響。很多地方仍然保留著從母系到父系的社會發展論的理論模式。戰後，很多台灣的年輕研究者遠赴歐美留學的時候，親屬關係研究不僅不再是西方研究者的關懷重點，非單系社會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沒有建設起來。在末成教授的書翻譯出版之前，人類學的親

屬關係研究在世界各地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對於阿美族是母系社會的質疑，沒有受到注意。

末成教授談到臺灣難以接受他的論點時說：「我覺得，如果台灣每個人都認為阿美族是母系的話，那也沒關係。」儘管教授以自己的觀點回應了批評意見，但他並沒有過度堅持自己的觀點。從親屬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阿美族的社會特徵並不能片面地被視為母系社會。但末成教授的回應，可能是他的隨和性格所致。

從父系血緣觀念濃厚的漢族人的角度來看，入贅婚和透過女性繼承遺產的阿美族是母系社會的看法，不能說沒有民族的偏見。另一方面，隨著原住民的文化復興運動，民族意識增強似乎令到阿美族開始以母系社會為榮。當阿美族人要面對強勢的漢民族社會，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和傳統性時，母系血統的解釋是一個相當有說服力的工具。末成教授所說的：「如果台灣人都這麼想的話，也沒有什麼關係」的說法，似乎是針對現在在台灣居住的，特別是今天的阿美族人。這大抵是田野工作者尊重當地人意願的觀點。

可惜的是，如上所述，本書提出的主要問題沒有被充分討論。然而，自譯書出版以來，情況似乎慢慢改變。無論如何，石溪的專著仍然是社會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典範，是一部描述20世紀60年代傳統色彩依然濃厚的阿美族社會的重要民族誌。筆者期待末成教授的分析最終能夠以新的形式應用於正在復興的親屬關係研究上。

四、代結論

隨著年齡關係，教授近年很少出席研究會。很多研究會因為新冠疫情而擱置下來。因此，見到末成教授的機會越來越少。當新冠疫情即將結束時，我與末成教授通過兩次電話。電話中，末成教授的生活似乎過得很充實。一方面每天和師母優遊生活，另一方面整理他的研究資料。末成教授表示，他希望將卑南族的照片和影片提供給台灣的年輕研究者。直到最後一刻，末成教授還是眷顧下一代。第二次通話大約在一年後。我聽到教授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悲傷和失望。

我本人受到末成教授各種方式的幫助和培

養。我從教授那裡得到的一針見血的建議，同時也讓我參與很多雄心勃勃的計畫，為我對原住民的長期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希望能夠在教授建立的基礎下，扶翼下一代來報答教授的恩情。

我謹對末成教授的去世再次表示誠摯的哀悼，並對他所提供的一切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註釋：

1. 末成道男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2. 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點》。東京：風響社，2001。
3. 《ベトナム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09。
4. 末成道男，《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 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5. 末成道男原著，羅素玟主編，何嫻儀、黃淑芬編譯，《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及其變化：從招贅婚到嫁娶婚》，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7。
6. 末成道男，《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 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頁302。
7. 黃貴潮、馬淵悟，〈《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への反論〉，《民族學研究》，50卷，1号(1985)，頁81-89。
8. 山路勝彦，〈台湾アミ族の性差と母の力〉，頁10，《社会学部紀要》，卷111(2011)，頁9-23。
9. 船曳建夫，〈末成道男著，《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民族學研究》。卷49-1(1984)，頁84-85。
10. Rodney Needham, "Remarks on the Analysi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R. Needham ed., *Rethinking Kinship and Marriage*. pp.1-33.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1; David M. Schneider, "What is Kinship All about?" In Priscilla Reining ed., *Kinship Studies in the Morgan Centennial Year*. pp. 88-112.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72.
11. David M. Schneider, *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末成道男教授在越南人類學研究的成就

宮沢千尋（日本南山大學）
（蔡志祥譯）

一、前言

末成道男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文化人類學家。他在日本、沖繩、台灣、韓國和中國等東亞地區的細緻的田野調查及成果，得到學界廣泛的認可。大抵，在末成教授的研究生涯中，越南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從1992年直至辭世這段期間，雖然末成教授仍然繼續台灣及中國的研究，但是，他出版了很多和越南有關的、主題廣泛的書籍和論文。作為末成教授在越南人類學研究領域

的第一位指導學生，我認為他有在日本建立越南人類學研究的使命感，他熱愛這個領域並且享受在越南的調查研究。下文將簡介末成教授的越南人類學的成就以及他的越南人類學研究的特徵和貢獻。

二、末成教授的越南人類學的研究主題

從廣義上講，末成教授的研究對象是家庭、親族、祖先祭祀、村落社會和和宗教等方面。在